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9.02.002

一带一路 倡议 互学互鉴中的共同化发展

李 泉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兰州 730000)

摘要: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受挫、全球治理模式亟待转型和国际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潜在风险因素明显增加的趋势,中国立足国家间相互信赖和全球发展困境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5年来的成功实践,正在成为推动沿线各国在互学互鉴中加强文化交流和实现合作共赢发展的公共平台,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创新空间。未来,中国更加需要以自信的大国气派和风范,阐释中方立场、倾听各方诉求,在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渠与平台,探讨共商共建共享新路径;主动倡导、设计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发展,积极推动各国政府间广泛交流,不断加强国际性多边倡议的深度实践,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与发展前景的协同为着力点,在中国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深耕细作,促成和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和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使命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一带一路;互学互鉴;全球治理;共同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9)02-0011-05

一、引言:人类必须共同应对全球化危机和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经验里探索前行是人类认识自我和寻求未来发展路径的天性。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历史的教训》中断言,历史不是教我们预测或者预言未来,“要是具备与现在的事态十分相似的去事态的知识的话……就未来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而言,至少告诉我们一种可能性。”^[1]同样,历史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出现的,但这要以我们平等对待成就和困境、优势和劣势为前提。不可否认,全球化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学习和展示的机会,但它也提供了挑战^[2]。以大跨度的视野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自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主要是在欧洲,随着个人与人道观念的积聚、太阳中心论的传播,国际与跨国协调交往的规模频率激增,一个程度较高的全球多样化与复杂化环境的历史历程经历了播种、萌芽和起步阶段^①。19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和全球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驱动下,伴随资本输出、对外殖民、经济掠夺和宗教价值观渗透,全球交往的数量与速度日益提升,西方世界通过福利国家与多边国际协调机制,暂时性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两极分化所引起的治理危机。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0世纪,伴随资源竞争、地缘经济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灾难深重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人类社会探寻全球治理共识的道路遭受重创,发达国家单边主导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也使得独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在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无法摆脱自身在全球分工中的依附性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生产的空间重组、产业体系的相互渗透、大量的人口迁移和信息网络互联互通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迫使

收稿日期:2018-12-21

作者简介:李泉(1976-),男,甘肃宁县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长期处于不同演进路径状态之中的不同文明,需要新的时代由其客观存在的自在状态逐步转化为包容性增强的自为阶段,即不同民族国家或经济体之间需要寻求和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秩序这一制度性公共产品,这对于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命运至关重要。因为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朝向全球化和国际互相依存的运动趋势而言,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立足世界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反思和检讨人类追求世界秩序的理想轨迹,毋庸置疑,我们还需要通过树立共享共赢的共同化发展思维降低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巨大不确定性。显然,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离不开民心相通基础上的互学互鉴与共同进步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世界各主要大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涉及全球治理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点议题迅速进入国际视野,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多维关注。因此,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利益联结和责任连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3]。

二、“一带一路”倡议:迈向共同化发展的现实逻辑

实践证明,现代化不是也不应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都有权利通过改革开放和卓有成效的努力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为人类整体现代化贡献力量^[4]。在外部环境明显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恰恰成为世界各国重新反思全球一体化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②。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中国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所持续倡导的建立全球新治理体系和发展新理念,使得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探求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具实践意义^[5]。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协调机制,也成为沿线各国在互学互鉴中加强文化交流和实现合作共赢的公共创新平台。同样令人欣慰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以来成绩斐然,中国与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18份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实践也在不断地启示国际社会,在全球化从一体化发展逐渐向共同化发展的转变过程中,非常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机制平台来促进人类对共同化发展的交流和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恰恰能够在促进中国及沿线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同时,为建立新的全球一体化体制机制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颇具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并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方案”,也一定能够为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拓展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首先,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贡献新型发展思路与合作模式,在互学互鉴中形成一种促进全球共同化发展的文化治理新认知。在这里,所谓文化的互学互鉴,就是世界各国在尊重主权独立性、文明民族性、道路多样化和发展水平非平衡等诸多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民族在文化思想、价值理念上的互相交流、学习借鉴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长期以来,受其历史传统的综合因素影响,西方国家的主导文化形态以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经欧洲迅速扩展到美洲、澳洲等广大地区并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文化走向。特别是经过三次科技革命的洗礼,倾心于物质的理性思维和物质文化导致西方社会越来越偏重于技术发展,工业经济及其信息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创造的物质奇迹将整个世界文化带进物质的漩涡。与此不同,以中国为代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华文化圈,强调了民族交往中的良慧之心与体恤之意,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注重对世界的属性及其功能的参悟,它能体察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在普遍运动中的融合共性,特别是通过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借势运力,寻找文化制度变迁和人在物质世界中不断走向完美的最佳途径。在中国特色转型发展的宏伟进程

中，“中国奇迹”的秘密何在？如何解释“中国经验”？全球不同领域的研究机构（智库）、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立足不同视角，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化解释。其中，颇有影响的解释之一就是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蕴涵着开放、包容、亲仁、善邻的历史传统——这是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这一凝聚 13 多亿人自信十足的“中国文化”与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勾连在一起，彼此支撑，相互推动所造就的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模，一举粉碎了各类喋喋不休“唱衰”中国的错误论调，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长期垄断并颠覆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有效性的神话。当前，“丝路精神”所秉持的基于“民心相通”基础上的国际文明互鉴新理念，为破解人类共同需要应对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应该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不断培养感情、增进了解、提升认同、激发共鸣、合作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逻辑起点。

其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梳理互学互鉴基础上的共同化发展理念，促进中国与世界更多发达或欠发达国家良性互动，并促使不同国家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模式。这是共同化发展中促进互学互鉴机制建立和实现合作共赢的逻辑目标。当今世界正处于加快发展变革趋势之中，信息、科技、知识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参与全球新治理的共同利益诉求。从现代国家经济关系演进或世界经济秩序变迁来讲，不同经济体在不同阶段的对外行动指南，几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维护本民族自身的综合利益为内在诉求，因此分享利益就成为国家在处理与别国经济关系中的“最高法则”^[7]。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发展实践的创新结合，在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的同时，创造性地最大化市场和政府的最优功能，在改革开放伟大探索和实践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完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进行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长时期内发展的综合绩效在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表现始终令人瞩目。尽管在所有的国际国内场合，中国政府都不断地强调“决不称霸”和“永不称霸”，不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在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它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大势，是促进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高效配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济政策互相协调、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共赢理念。但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一带一路”建设所提出的中国方案在主观上的真心诚意，而在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是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作为其基础定向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解读、对“一带一路”宗旨的阐释和对破解全球和平与发展困境时所倡导的中国方案，必须彰显中国对协调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价值和推动国际社会重塑国际制度的必要性，摆脱西方国家所预设的中国崛起过程中与外国利益对立的狭隘眼界，从而在全球化时代为真正新型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重建赢得广泛共识^[8]。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倡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实现，要求世界各国基于更加相互依赖的基础共同参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合理化的博弈之中^[9]，进而为新全球化时代拓展人类共同化发展引领下的国际平衡机制这一宝贵的公共产品提供制度创新空间。

第三，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型互信结构框架，形成一种共同化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具体实践，同时示范带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多元对话与交流合作。这是人类文明互学互鉴和实现互促共进的逻辑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立足时代潮流向全世界反复阐释的对外关系新理念。从人类文明的哲学基础审视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和从“虚假共同体”迈向“真正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发展逻辑高度契合^[10]。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新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发展观，是我们基于对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研判，这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意义非凡^[11]。与此相应，中国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层面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权实体化、具象化，这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提出 5

年来的成就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为主体、结构关系、国际大家庭和国际新秩序中,这种政治经济互信结构还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中。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特质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于世界各国的内生吸引力与外衍感召力日益强大^[2]。这就要求中国以自信的大国气派和风范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从传统优秀文化体系中寻找促进全球共赢发展的思想资源,阐释中方立场、倾听对方诉求,让更多民族国家以正确的义利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解中国的包容性智慧和渐进式进步,在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渠与平台,探讨共商共建共享新路径;利用全媒体时代新的传播理念和技巧,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发展知识与混合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优势,主动倡导、设计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发展,积极推动各国探索建立在国家间互信结构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新模式,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使命的最终实现。

三、结语:共同化发展的前景展望

认真回顾习近平2015年10月12日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的学习讲话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我们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成果互学互鉴和实现共同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南。在不同民族国家因不同目标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未来变成了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世界。在全球化相互依存的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从文明互鉴层面看,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的跨文化“多极对话”,呈现的是一条根植于各自文化世界的参与者共同加入到这场完全敞开的跨文化对话之中的道路。人类世界正在促使相互依赖的时代和行星时代向宇宙时代或真正伟大的太空时代前进。人类共同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我们还必须建立我们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创造一个基于共享星球认知的未来,基于平衡我们所知和所不知的未来,基于我们能在一个地球社区和平生活的未来,基于对这些原则重组的未来,基于厘清进化、适应和学习之间关系的未来^[3]。

每种形式的社会——不管其是否改变——都是有弊病的。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的社会是:一个民族既能保留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又能拥有新的机会^[4]。已经过去的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自主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为人类社会贡献出了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样本。立足现实,任何国家根本不可能期待通过打一场贸易战或者发动一场战争就能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难题。面向未来,对于任何国家和人类个体而言,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日益呈现出同呼吸共命运,更加变得休戚与共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互学互鉴与人类文明相向而行的过程中,共同化发展理念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学习——“学习如何学习”和“学习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③,这种互学互鉴所带来的公共智慧和公共产品会深入到沿线各国人民的内心并不断开花结果,使得每个民族国家的不同文明成果能够成为共同化发展的世界的一分子,在共同的全球命运推动下互促融合,在和平友谊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进程中,共同迎接人类美好命运的新未来!

注 释:

① 事实上,从15世纪早期至20世纪初期,对全球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格里高利历的传播与世界时间的采用、非欧社会进入国际社会、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成为议题、世俗运动的兴起、全球竞争的发展如奥林匹克和诺贝尔奖。20世纪初期及其以后,围绕全球化过程的脆弱环节国家间出现争夺霸权,全球范围因生活方式不同而引发诸多国际冲突,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一战、国联、大屠杀、二战原子弹的袭击、联合国的成立、登月等,迫使人类步入“后唯物主义”的不确定性时代。同时,全球觉醒提升过程中的冷战、核武器扩散等使得全球机构与运动数量大增,社会越来越需要面对跨文化和多族裔问题,国际体系更加游移,对作为种类-共同体的人类的关怀日益增强。与此相应,全球媒介体系不断整合,网络的加速普及,世

界市民社会与世界公民、地球村、新新人类等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现象和新新问,也不断引起人们的更多兴趣。参见[美]罗兰·罗伯逊:《为全球化定位:全球化作为中心概念》[J],(梁展译自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2-3), 1990, pp.15-30.)《全球化话语》[M],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月第1版:第1-15页。

- ② 当然,进入21世纪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特点,全球任何国家都有推动重建国际秩序的历史境遇。但是,为何唯有中国能够率先提出超越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呢?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从来就不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而始终是一种集体主义或公共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与西方经典现代性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中国道路中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关于对此详细解释,可参见:桑明旭、郭湛:《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N],《光明日报》,2018年2月26日第15版。
- ③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在其2014年出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路径》(Joseph E. Stiglitz and Bruce C.,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ety[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提出,“发展,意味着学习如何去学习。在21世纪人类迈向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学习型社会’,即一个基于由学习得来的技术进步,而非强调资源累积的社会发展模式,对于持续的发展和增长尤为重要。因此,创建学习型社会应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重要观点启发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全球新治理体系转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事关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对话中,不同经济体在文化制度领域的互学互鉴,至关重要。(例如,近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中国模式”,既是中国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姿态向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学习的结果,也是中国不同区域间通过相互竞争和不断模仿、学习乃至实现创新,以及关于促进发展的知识不断传播和共享的结果)关于学习促进增长的其他论述详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增长的方法:学习型社会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M],陈宇欣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6月第1版。

参考文献:

- [1] 岡崎哲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组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 [2] Peter N. Stearns.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M],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3:132-133.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027/c1001-29613459.htm>, 2017-10-27.
- [4] 郝永平,黄相怀.中国改革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化难题的启示[N].经济日报,2018-08-09.
- [5] 裴长洪,刘洪槐.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8,(3):4-18.
- [6] 艾斐.中国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外溢效应与文明互鉴[N].发展导报,2017-07-07.
- [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46-349.
- [8]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7,(10):5-16.
- [9] 李滨.新全球治理共识的历史与现实维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7,(10):17-27.
- [10] 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125-132.
- [11] 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9-46.
- [12] 詹小美,王仕民.空间交融视域下的战略互信[J].中国社会科学,2017,(10):27-36.
- [13] 马尔科姆·麦金托什.21世纪思考:新政治经济思想[M].薛俊波,李华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36-37.
- [14] 斯图亚特·R.林恩.发展经济学[M].王乃辉,倪凤佳,范静,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

(责任编辑:颜 莉)